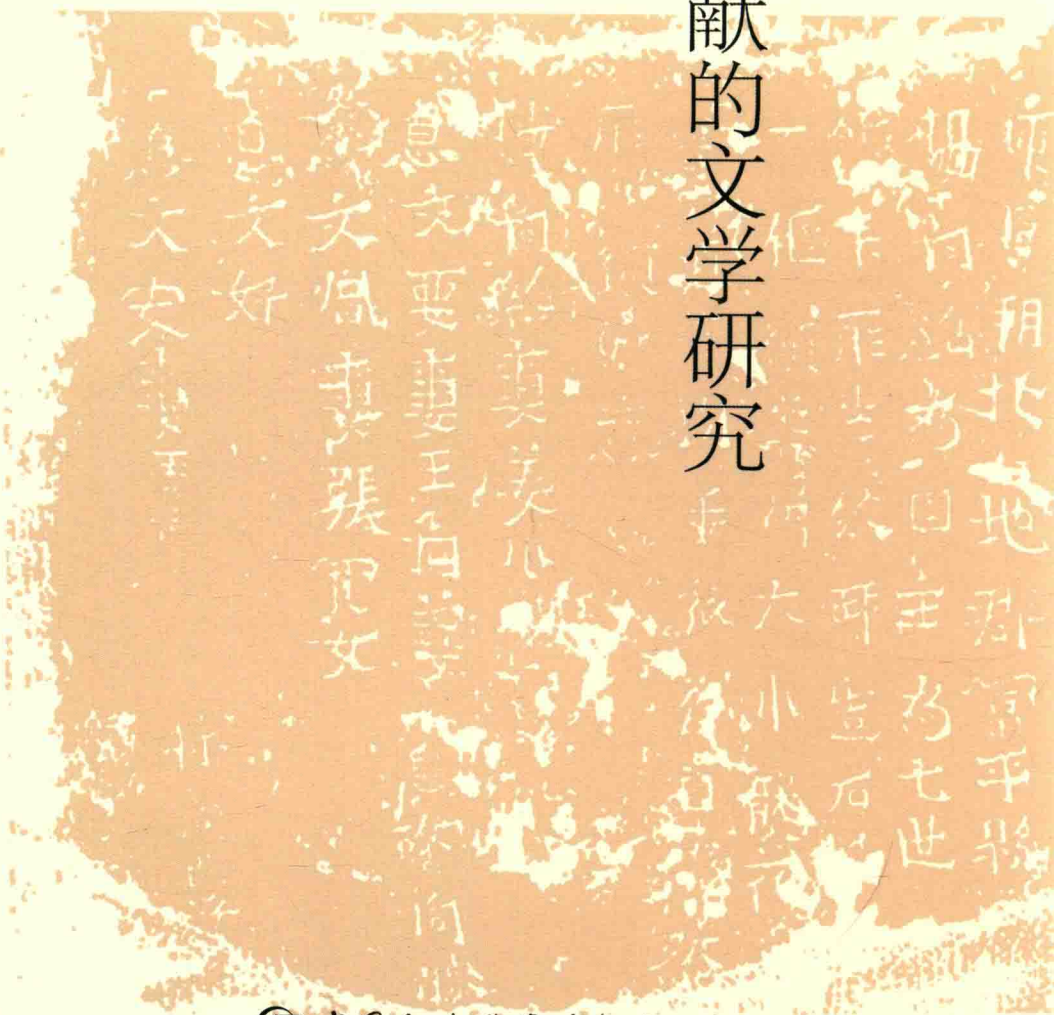


北朝

石刻文献的文学研究

张鹏○著



北朝

石刻文献的文学研究

张鹏○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朝石刻文献的文学研究 / 张鹏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 - 7 - 5161 - 6238 - 5

I. ①北… II. ①张… III. ①石刻—文学—研究—中国—北朝时代 IV. ①K877.4②G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356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无 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25
插 页 2
字 数 276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资助

咸阳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咸阳师范学院拟建硕士点支持学科著作出版资助

咸阳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省级特色专业著作出版资助

内容提要

本书以北朝石刻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文体学、文本分析以及文学史研究等方法，对石刻文献中包含的文学文体、文学文本及其所体现的文学的时序特征、地域特征以及与文学有关的宗教、文化因素等做了全面论述。这些论述以图达到以下目的：首先，通过对北朝石刻文献中文学文本的拣择、描述，补充北朝文学的基本材料，把石刻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使得北朝文学文本更加丰富、完整，为全面客观地描述北朝文学提供文本支持。其次，通过对石刻文献中的文学文本及其文体特征、发展分布的研究，与现有的北朝文学史对照，补充说明北朝文学发展的各个环节，更为详尽地描述这一时期文学发展、演变的过程。最后，通过对石刻文献中所包含的儒、释、道以及不同民族文化因素的分析，结合传世文献，厘清它们对北朝文学的影响，解释北朝文学特征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

为清晰论述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本书在绪论部分辨析了石刻、石刻文献、石刻文学这三个概念，将器物、文字信息和文学文本区别开来。在第一章中，通过分析不同文本的文体特征，确立了颂碑文、墓碑文、墓志、造像记等石刻文学文体，补充、扩展了北朝文学中的散文门类。在第二章中，通过对上述四种文学文体中思想观念和情感模式的论述，说明其作为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涵，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应用文。这两章的结合，共同说明石刻文献中的这些文本作为石刻文学所具备的文学作品的特征及其与其他文学文体的关系。

在第三章中，本书运用结构分析的方法，进一步论述了石刻文学的篇章结构、修辞手法、句式特点等不同结构层面的文学特征。在逻辑结构上，石刻文学有递进式和分总式两种类型，而从叙事结构上看，与表达赞颂、崇拜的功能相适应，石刻文学都包含了双重时空结构。在修辞和表现

手法上,比喻和用典的提升效果,也适宜于表现由具体形象、事件所表达的价值观念和宗教感情。石刻文学在句式上的骈偶化,则集合了辞赋、诗歌、散文诸文体的成就,表现在碑文、墓志、造像记等文体中。

第四章通过对石刻文学不同文体时序特征的描述,指出石刻文学发展中各文体的变化过程以及文体发展的不平衡。可以概括为:碑文这种在北朝以前已经发展完备的文体,其变化较为缓慢。墓志这种脱胎于碑文但又自具抒情特征的文体,更能积极吸收南、北文学的成就,在太和后期形成以后,迅速表现出文学技巧多样、语言骈偶化程度高的特点。造像记这一文体在太和后期成熟之后,其发展相对墓志要缓慢,最晚到北魏末,其表现手法和语言特色渐趋成熟,并以其明显的宗教内容形成了奇异瑰丽的审美特征。

第五章以石刻文学的地域分布为基础,描述了今天的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陕西几个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碑志文、造像记的文学特征,并与前一章的时序特征相结合,指出在河南,以洛阳为中心的石刻文学处于最发达、最活跃的状态,更多地接受、吸收了多种文学因素。而河北地区则相对保守。在造像记中,河北、山西一带的北朝后期作品显示出很高的文学成就,可见,随着政治中心从洛阳向邺都的迁移,不同地域文学呈现出动态的不平衡。

第六章从作家的文学素养和北朝佛、道二教活动的特点入手,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从元氏家族墓志中可以看到,北魏皇族在太和以后所形成的家族传统,呈现出多元化、包容性的特征,已经超越了两晋南朝的汉人文化,初步具有了隋唐文化的一些特质。北朝佛、道二教的兴衰,都与儒学政治的支持与否紧密相关,这样,在与儒学的不对等关系之下,它们的发展都没有在精神层面对以儒学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产生足够的影响,难以进入主流作家的思想世界并对以应用性散文为主的北朝文学创作产生明显影响。在石刻文学中,往往更多地表现出儒学观念对宗教的渗透。

附录部分列举了北朝石刻文献中记载的作家94人,并依据文献考证了他们的生平、创作。这是对北朝作家、作品的有益补充,同时也是本书论述过程中的重要文献依据。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北朝石刻文献的文体特征	(8)
第一节 北朝文学的文体构成	(8)
第二节 北朝颂碑文的文体特征	(15)
第三节 北朝墓碑文与墓志的文体区分	(25)
第四节 北朝造像记的文体特征	(35)
第五节 从《姚伯多造像记》看北朝造像记的文体来源	(42)
第二章 北朝石刻文学中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模式	(51)
第一节 碑铭中的不朽观念及赞颂	(51)
第二节 北朝墓志中的生命意识	(58)
第三节 佛教造像记福报体系中的儒佛交融	(67)
第四节 造像记中的宗教感情及其与碑志文的关系	(74)
第三章 北朝石刻文学文本研究	(86)
第一节 不同文体的篇章结构及其异同	(86)
第二节 石刻文学中的用典和比喻	(95)
第三节 石刻文学不同文体句式的比较	(104)
第四章 北朝石刻文学的时序特征	(114)
第一节 北魏前期石刻文学的存在及特征	(114)
第二节 石刻文学铭词与北朝诗体的发展	(124)

2 北朝石刻文献的文学研究

第三节 北朝辞赋与颂碑文、造像记的变化	(134)
第四节 碑文、墓志中的南北文学交流	(144)
第五章 北朝石刻文学的地域特征	(154)
第一节 不同地域出土墓志的文学特征	(154)
第二节 造像记的地域特征及变化	(165)
第三节 北朝散文的地域差别与石刻文学的地域特征	(174)
第六章 石刻文献中北朝文学的外部因素	(182)
第一节 墓志所见北朝元氏家族作家的文化素养	(182)
第二节 北朝石刻文献中的佛教活动及信仰动机	(191)
第三节 北朝道教的特点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203)
余 论	(215)
附录 石刻文献所见的北朝作家	(219)
参考文献	(250)
后 记	(253)

绪 论

一 石刻、石刻文献和石刻文学

以中国古代石刻为对象的研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从传统的金石学，到今天的考古学、历史学、文字学、文学、美术学、建筑学等学科，都对古代石刻从不同角度做了考察。在这些学科门类中，对古代石刻作出比较系统、完备描述的是考古学。赵超在《中国古代石刻概论》中，对中国古代石刻做了如下分类：

近代以来，人们对石刻的定名和分类日益规范化。在此，笔者尝试提出一种在以往分类基础上，吸收各方面优点，兼顾到外部形制与铭文内容的石刻分类新方法，即以外部形制作为大类型划分的原则，对这种类型中的基本形制演变形成时的有关器物形制及分支一并进行分析。具体在每一大类中，再根据其表述内容、用途、铭文文体等方面的差异作进一步细致的分类说明。……我们划分的石刻类型大致为：刻石（包括摩崖与碣）、碑、墓志、塔铭（附带舍利函等佛塔的附属石刻）、经幢、造像题记、画像石、经版、地券以及建筑物附属零散刻铭等 10 类。^①

这种以器物形制和铭文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的分类，基本涵盖了考古发现中的全部石刻。

石刻所包含的信息是多方面的。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石刻记录和传达了古代社会的历史、文化内容，是以石质器物为载体的对历史文化的记

① 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文物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 页。

载,属于广义的文献范围。作为文献的载体,石刻的记录功能具有综合性的特点。石刻的形制、文字、图像、组合位置等,都传达出相应的历史文化信息。本书的研究内容即基于石刻的综合性特点,将其作为传世文献的补充,对其中包含的与文学有关的信息进行分析,以期更为详尽地描述北朝文学发展的环节、次序。为了描述的准确以及行文方便,在这里,先区分两个概念:本书所称的“石刻”,指器物名称,即《中国古代石刻概论》中提到的具有特定外部形制的刻石。本书所称的“石刻文献”,取狭义的文献的内涵,特指石刻提供的文字信息,包括铭文、题名等。这两个概念为包含关系。

叶程义在《汉魏石刻文学考释》中,提出了“石刻文学”的概念,在该书的序言中,作者指出,汉魏石刻文学:“以质而言,以石刻摩崖为主,与石质相同之玉,间亦述及焉。至于砖瓦印章之属,则略而弗论矣。所谓文学作品,以姚姬传氏《古文辞类纂》所定之尺度,凡属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类之属,而为石刻者,皆采录焉。”^①从材质和文体两个方面限定了石刻文学的内容。以文体罗列的方式限定文学的内涵,在逻辑上虽然不够严密,但作为传统文学理论常用的方法,以此对石刻文学进行界定不失为首选途径。在此基础上,本书所说的“石刻文学”指上面所说的“石刻文献”范围内,具有固定的文体特征,并具有与传世文学作品中的散文、辞赋、诗歌等文体相似的文学特征的文本。这里所说的“文学特征”主要通过文本的精神内涵、篇章结构、句法、修辞等层面来考察界定。至于个别如砖质墓志,或者石窟中保留的墨书题记等,因为其在文体上具有与石质镌刻铭文相同的性质,也会适当涉及。

二 北朝石刻文献概述

从现存的北朝石刻来看,其类型包括了前引10类除了经版以外的所有类型。在这些类型中,从数量上看,最多的是造像和墓志,其次还有一些碑、买地券、摩崖、陵墓建筑构件等。由于石刻文献和石刻关系密切,就按照上述石刻分类,对其文字信息做一简要描述。

^① 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页。

碑：从石刻功能上看，碑有志墓、颂德、记事等的区别，从石刻文献的角度，碑除了提供作为石刻文学的碑文以外，在其题名部分，还提供了很多与当时官制、种族、行政区划以及人口分布、迁移等有关的历史、文化信息。在北朝碑中，还有一些与佛教、道教活动有关。这些碑从功能上看，除了上述三种功能之外，还带有发愿的性质。如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宕昌公晖福寺碑》，在碑铭的最后有：“庶运徽因，庆钟皇圣。爰赜先慈，永超尘径。”^①这与北朝造像记中所出现的发愿内容有相近之处，是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影响碑功能的表现。

墓志：墓志作为在墓葬中标志墓主人身份等信息的器物，其起源甚早，考古界对其也有详尽的论述。从石刻文学的角度来看，从十六国到北魏太和时期，墓志作为一种应用文体，经历了从模拟碑的体制到独立完备的过程。太和以后，更从价值观念、文化内涵到文学技巧，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此后中国古代散文的一种重要文体。

造像：作为石刻，造像和碑有一些不易区分的地方，很多造像也被称为“造像碑”。对于造像碑的考古学描述，可以参考罗宏才《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一书。^②从器物功能来看，造像作为宗教活动的产物，是和祈求福报等宗教信仰和宗教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称“像”还是称“碑”，都与宗教活动密切相关，其在形制上的区别也在于有无作为宗教崇拜对象的神祇形象。从石刻文献来看，在一些造像铭文中也自称“碑像”或“碑”。如北魏普泰二年（532）《程陁奴造像记》即有：“宁远将军故程延贵息陁奴谨为一切造碑像一躯。”^③东魏兴和四年（542）《李显族造像记》也有：“李氏合邑造口像碑颂文。”^④其文本体制有明确的发愿部分，这也是与碑文不同的地方。作为石刻文学，一些碑文中虽然有个别与宗教有关的语句，涉及发愿的内容，但并未出现明显、系统的造像人和福报群体。基于这两点，即有无“像”的形象和铭文中有无发愿及福报群体，无论石刻的形制如何，与造寺、造桥等宗教活动有关的，以记录

① 韩理洲等：《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页。

② 罗宏才：《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该书第二章到第四章在杨泓提出的造像碑包括“扁体碑形造像碑”和“四面体柱状造像碑”的基础上，对造像碑概念的变化做了梳理并对现存的造像碑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杨泓的观点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造像碑”条（见罗书第12页注）。

③ 韩理洲等：《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531页。

④ 同上书，第586页。

事件和赞颂行事为内容的，都将其放在“碑”类中，属于记事碑范围。对于铭文中“碑像”或“碑”等名称的造像，由于其器物功能和文体功能与铭文中称“石像”、“文石像”、“四面像”、“立像”等的造像相同，它们的铭文可以统称为“造像记”。

除了与碑形制相似的造像外，雕刻佛道造像，或单体，或者为一佛二菩萨等组合形式，以及石窟像龕及其变形的，都归于造像类。除神灵形象以外，一些称为“塔”、“天宫”的石刻，也属于广义的造像。如北魏天安元年（466）《曹天度造九层千佛石塔记》称“乃竭家珍，造兹石塔”^①，北魏正光五年（525）《杜文庆等二十人造像记》称“造天宫一区”^②。从拓本来看，“石塔”、“天宫”都是在造像上加了不同形状的像龕。从石刻文献的角度看，这些文本的功能为同一类，都是造像发愿的宗教活动的记叙，可以将其统称为造像记。造像记的文本有不同的类型，在佐藤智水的《北朝造像铭考》和侯旭东的《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对其做了区分，称为“A类”和“B类”。从石刻文学的角度看，这些文本，尤其是B类在文体上形成了完备的造像记文体，在北朝发展成熟，和墓志一样，成为有别于其他文体的一类散文文体。

北朝石刻文献的另外一些类型还有摩崖、买地券等。这些类型所占比例较小，摩崖主要有一些刻经和题记，主要分布在山东邹城附近，还有河北省邯郸市北响堂寺石窟北朝刻经，河北磁县鼓山题记等；另外，在山东莱州云峰山、大基山还有北魏郑道昭题字多则。北朝地券和镇墓文作为墓葬中的随葬器物，与墓碑和墓志有一些区别，也有其独特的文献价值。

按照以上思路，北朝石刻文献的存在，主要是碑、墓志、造像等器物上的文本信息。这些文本反映出北朝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状态、文化构成以及思想感情。它们中的一部分具有完整、固定的体制、语体、审美特征，成为独立的文体，为描述北朝应用性散文的存在、流变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成为北朝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载体的特殊性，将其称为石刻文学。从文学角度将其文体称为碑文、墓志、造像记等，以示与考

① 韩理洲等：《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8页。

② 同上书，第502页。

古学上石刻名称的区别。在这些文体中,有些在传世文献中已经受到关注,如在作家别集和总集中收录的碑文和墓志,另一些文体,如造像记,学界尚未对其从文学角度给予系统论述。在本书的论述中,不区别文本传世文献或考古发现的留存方式,将它们同样视为散文文体的组成部分。这样,石刻文学起到了补充、丰富传世文学文体、内容的作用。

三 本书的研究思路及方法

笔者曾参与魏晋南北朝至隋代的文献整理工作,作为主要参与人完成《全三国两晋南朝文补遗》《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和《全北齐北周文补遗》的整理,其中涉及的主要内容是石刻文献。同时,也从传世文献出发,对北朝尤其是北魏文化、文学做了一定程度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北魏儒学与文学》。在研究过程中,笔者深感北朝文学研究的局限,一方面是一手资料的不足,这是一个客观限制。另一方面,由于对文学作品的限定,很多文献没有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从而造成在描述北朝文学存在状态以及发展过程时不能做到全面、客观、系统。从上述认识出发,通过对北朝石刻文献的考察,可以认为,北朝石刻文献的留存,保存了与北朝文化、文学有关的大量信息。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可以补充文学研究的直接材料。

从前述北朝石刻文献的整体情况可以看到,石刻文献对于补充北朝文学研究中资料不足的缺憾,有着重要意义。在对北朝墓志的研究中,石刻文献的文学意义已经突显出来。魏宏利的《北朝墓志文研究》^①运用散文研究的方法,对墓志这一文体做了分体文学的研究。但对于造像记等其他文献,目前研究多从思想史、宗教史、民俗学等方向展开,以美术考古学为代表的新兴学科也从美术学、图像学等角度作了积极的探索。但总体来看,学术界对于造像记的文学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很多问题有待深入。从上述北朝文学研究的局限性出发,笔者认为,从北朝散文发展的背景来看,在北魏初期,鲜卑政权对汉族文化还了解不多,存在敌视的条件下,石刻文学中保留了一些十六国到北魏的散文作品,让我们可以窥测北魏初期汉族作家散文创作的一般水平。北魏太武帝到孝文帝时期,民族矛盾和政治矛盾错综复杂,使得作家在章表疏记等应用性散文中不能充分展示自

^① 西北大学 2008 年博士论文。

己的文学才能，而在石刻文学中，由于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较为疏远，而且出于记功、赞颂等功能的要求，允许适当的铺陈、夸饰、对偶等技巧的展示，能够表现作家的才华，为太和以后散文的发展做了技巧上的准备。孝文帝太和改制到北魏末期，由于汉化政策的推行，以儒学为主的汉族文化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文学的发达程度作为文教兴盛的标志而备受重视，进而引起并加强了北朝作家对以南朝文学为主要代表的汉族文学的学习，各种文体和文学技巧得到长足进步。在这样的背景下，碑文、墓志、造像记等石刻文学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组成部分，以温子昇等人的创作为代表，展现出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显著特征。北齐、北周以后，虽然在文化上，两个政权的取向不同，但在石刻文学的发展上，基本延续了北魏后期以来的方向，最后经由庾信的创作使其达到北朝的巅峰状态。

除了作为石刻文学载体以外，石刻文献和石刻本身还为研究北朝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支持。通过墓志的记述可以看到，北魏太和以后，整个社会对于汉族文化、文学的重视，以及各种不同思想因素的流行、影响。大量墓志记述了墓主人的文学才能、文学活动，有些还记述了他们的创作情况。在这些墓志中，除对其儒学影响的品德行为加以描述以外，也出现了对于墓主人道家、道教思想观念，以及佛教信仰的描述。在造像记中，儒、佛、道三者的融合清晰可见，道教造像的兴起及其对佛教造像的明显模仿，造像记在表达不同宗教观念中的相似性，造像记中对造像人家族、世德的记述等，都显示出三教关系中的趋同特征。从大量造像题名中还可以看到不同宗教观念信仰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种族中的流传。石刻和石刻文献所包含的这些信息，对研究北朝文学的思想文化背景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上述问题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石刻文学在文体上是对传世文学的补充。其次，石刻文学的文学特征与石刻文献及传世文献中所反映的政治、思想、文化及其他艺术门类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后，石刻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与传世文学的演进共同反映出北朝文学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本书的基本框架即依据这三个方面内容建构展开。

在上述论题的研究中，最基本的方法是文献学的方法。在全面收集原始资料的前提下，通过文献学的方法，描述石刻文学、石刻文献的内容、分类、特点、意义、流传。在此基础上，文学研究的方法是最主要的研究方法。石刻文学的研究，本质上还是古代文学研究，其主要内容

是古代散文研究。对其主题、结构、表现手法、语言技巧以及诸方面联系的分析，揭示碑文、墓志、造像记等作为文学作品的特征和意义，并探讨它们的文学史价值，是本书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由于石刻文献的综合性特点，在研究中，还需要运用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美术学的一些方法，从其器物的各个层面发掘其文化信息。作为新兴学科的美术考古也从方法和材料上对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借鉴。总之，以文学、文献学为中心，以文学研究为主的多学科综合方法是本书研究北朝石刻文献的基本方法。

第一章 北朝石刻文献的文体特征

第一节 北朝文学的文体构成

在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中，对于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区别并不很清晰。对文学的界定，往往是由某一特定文体引发的。汉代对《诗经》的解说，引起了对诗歌这一文体批评的繁荣。西汉辞赋的兴盛，又使得文人对“赋”的功能、特点、创作方法有了较为完备的总结。这样，以某一文体为对象的文学批评虽然涉及了一些文学理论问题，但对于文学的本质特征并未作出一个明确统一的界定。到魏晋南北朝，不同文体的创作和批评有了深入的发展，出现了《文心雕龙》这样“体大思精”的系统性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用道家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论述了文章产生的本原，其《原道》篇指出：“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①认为文章发于人的“心”，与天地万物色彩、高下的交错杂糅相应，自然要有文采。这种由“道”生“心”，由“心”生“文”的观点，解释了文章的来源，涉及了文学要有文采的本质特征。但这种论断仍然是一种描述性地说明，对文采这一特征的论述，并未上升到文学本体的定义上。王运熙、顾易生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并未将其作为文学本体论看待，仅称其为“基本思想”^②。整体上看，《文心雕龙》列举了诸类文体，对其一一做了描述，将其作为文学的全部内容，其核心

^① 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页。

^②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39页第三章第三节标题。

是对不同文体特点、写作方法的论述。这与从曹丕以来，以文体说明文学的做法是一致的。

在《文心雕龙》之前，史家对作家创作的记述也采用罗列文体的方法。《汉书》将作家文学创作的才能称为“赋颂”，一般特指赋。李士彪在《魏晋南北朝文体学》中指出汉人文体观的特点，有“赋、颂不分”^①等三条。从《后汉书》《三国志》的记载来看，对文体的记述已经非常丰富，与《文心雕龙》和《文选》所列出的大类基本一致，文体类型已复杂而完备。在北朝，对文体的看法也有类似的特点。以《魏书》为例，其中所提到的作家创作的情况，也与两晋南朝类似。《魏书·高祖纪》载：孝文帝“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②。《魏书·刁雍传》记：“凡所为诗赋颂论并杂文，百有余篇。又泛施爱士，怡静寡欲。笃信佛道，著教诫二十余篇，以训导子孙。”^③《魏书·赵逸传》记：“凡所著述，诗、赋、铭、颂五十余篇。”^④所记文体比较详备的如《魏书·高允传》记：“允所制诗赋诔颂箴论表赞，《左氏公羊释》、《毛诗拾遗》、《论杂解》、《议何郑膏肓事》，凡百余篇，别有集行于世。”^⑤《魏书·崔光传》记：“凡所为诗赋铭赞咏颂表启数百篇，五十余卷，别有集。”^⑥综合《魏书》的记载，当时重视的主要文体有：诗、赋、碑、诔、咏、赞、颂、箴、铭、表、启、诏册 12 类。在北朝石刻文献中，也有对文体名称的记述，如太昌元年（532）《元延明墓志》记：“其诗赋铭诔，箴颂书奏，凡三百余篇。”^⑦与史书所记基本相同。这 12 种文体比《文心雕龙》所列的文体名称要少，这可能与北朝文人的创作实际有关，同时，史书并不以文体分类为关注重点，也是造成文体种类简略的一个原因。

在北朝传世文献和石刻文献中，对其文体功能、审美特征等论述较多的，主要有诗、赋、颂、碑文等几种，可见，这些文体在北朝被认为是文

① 李士彪：《魏晋南北朝文体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 页。

② 魏收：《魏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87 页。

③ 同上书，第 871 页。

④ 同上书，第 1145 页。

⑤ 同上书，第 1090 页。

⑥ 同上书，第 1499 页。

⑦ 韩理洲等：《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三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20 页。